

宋代官府力量与成都节日市场

魏 华 仙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6)

摘要:两宋时期的成都,物产丰富,商品经济发达,全年每月都有以主要商品带动的集市贸易。地方官府利用成都人喜游乐、爱消费的习俗,通过宴集活动来聚集和引导民众的节日消费,使成都节日市场十分繁荣,尤其是基于节日期间人们对生产工具、生活物品的需求而产生的蚕市、药市、酒市、夜市等最为活跃。宋代成都节日市场既以地方习俗为支撑,又有官府力量起作用,这就使其既保持了长时期的繁荣,又随着官府政策和命运的变化而兴衰。

关键词:宋代;成都官府;成都节日市场;节日消费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1-0159-10

宋代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缣缕之赋,数路取贍;势严望伟,卓越他郡”^①。无论在人口数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处川蜀之首,是全国的一个重镇,备受朝廷重视。承载成都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内涵的节日,则呈现出数量多、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人们物质和文化消费增多、市场化因素明显增强等特点。学界对宋代成都的游乐之风^②、蚕市^③有过探讨,但对其节日市场还不见专门讨论^④。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不仅有助于成都城市史的研究,也有利于宋代区域史、四川史的研究,对成都现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 宋代成都官府促进节日消费的举措

节日消费是士庶个人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而选择的节日生活标准和采取的消费行为。其中,个人的经济收入虽然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但节日又与平常有别,即它有特定的全民性的习俗活动及深刻的文化意义,所以节日消费又并非完全私人而具有公开的集体的特点。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民间节日习俗既有顺应、维护和利用的一面,也有引导、修补甚或改变的一面。宋代成都官府对节日消费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一)通过宴集活动使士庶集中消费

南宋人写的《岁华纪丽谱》开篇就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袷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邀床,而谓太守为邀头。”^{[1]99}邀头即宴集活动的组织者;活动空间是官员们宴集的地点,还摆好坐凳(邀床);活动内容是观看地方奇幻技艺、百变杂戏表演,以及官员们及其家人的华丽衣装、鲜洁车马,官员们出入由倡优鼓乐、吹拉弹

收稿日期:2012-09-19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校级科研启动项目(编号:03708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华仙(1964—),女,四川仁寿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代社会经济史。

唱引导的派头等等。这些内容被固定下来,成为“故事”,吸引士庶百姓盛装打扮、扶老携幼前去观看这平常难得一见的希奇,享受节日休闲的快乐时光。这种由官员们宴集而进行的节日活动,从新年依始的正月元日一直持续到年末的冬至节,见表1。

表1.宋代成都节日官员宴集及士庶活动表

日期	宴集地点	官员活动	士庶活动	资料来源
正月元日	安福寺	塔上燃灯,太守晚登塔眺望	燃香、拜塔、挂旗以禳兵灾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元日登安福寺塔》、《范石湖集》卷十七《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
正月二日	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	妓以新词送茶	扫墓、郊游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日出城》、《范石湖集》卷十七《初三日出东郊碑楼院》
正月五日	五门		游蚕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五日州南门蚕》
上元节	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	观山棚变灯,残灯会	观灯、游赏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上元灯夕》、《鸡肋编》卷上、《岁时广记》卷十《州郡灯》
正月二十三日	圣寿寺,南宋时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奠献、登亭	民鬻农器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
正月二十八日	大智院	奠拜	游寺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十八日谒生禄祠游净众寺》
二月二日	宝历寺	游江	踏青、游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鸡肋编》卷上、《岁时广记》卷一《游蜀江》
二月八日	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		游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八日大慈寺前蚕市》、《岁时广记》卷一《售农用》
三月三日	万岁亭	射箭、泛舟	登山、郊游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三月三日登学射山》、《岁时广记》卷十八《出北门》
三月九日	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		游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九日大慈寺前蚕市》
三月二十一日	鸿庆寺、大慈寺		摸石求子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十一日游海云山》
三月二十七日	净众寺、大慈寺	奠拜	拜庙、游蚕市	《岁华纪丽谱》
四月初	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	祭鬼、开西园	寒食节,上坟、西园游观	《岁华纪丽谱》、《鸡肋编》卷上
四月十九日	梵安寺	谒祠、观诸军骑射、游浣花溪	游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四月十九日汎浣花溪》、《鸡肋编》卷上
五月五日	大慈寺		游市	《岁华纪丽谱》
六月伏日	江渎庙	泛舟避暑	临池张饮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伏日会江渎池》
七月七日	大慈寺	登楼观夜市	乞巧	《岁华纪丽谱》、《岁时广记》卷二十八《市药物》
七月十八日	大慈寺	散孟兰盆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观施孟兰盆》
八月十五日	西园,南宋时大慈寺	玩月		《岁华纪丽谱》
九月九日	玉局观宣诏亭、晚宴五门	设棚屋,游观三日	游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重阳日州南门药市》、《岁时广记》卷三十六《置药市》、《吸药气》、《鸡肋编》卷上
十二月冬至日	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

由表1可知:一、全年所有节日中,除了除夕没有官员宴集外,其余节日都有宴集活动。庆历三年七月,有臣僚上言:“益州每年旧例,知州已下五次出游江,并山寺排当,从民邀乐。”^{[2]刑法2之26}但上表显示,是远远不

止五次的。二、表中 21 个宴集日中,一天有早、晚两次宴饮的达 7 次,占全部宴集活动的 1/3。三、宴集活动多在寺院里进行,其中在大慈寺举行的最多、达 12 次,占全年宴集活动的一半多,其次是五门、金绳院各 3 次,移忠寺 2 次。这是因为唐宋时期成都佛事鼎盛,寺庙林立,而大慈寺为唐玄宗时所建,唐僖宗、后蜀孟知祥、孟昶等都曾光临此寺,其规模之大,在同时代的海内名寺中,堪称首屈一指,因此成为宋代成都岁时游乐和官府廷宴首选之地。四、官员们宴集活动都有当时的风俗习惯基础。如元日在安福寺塔前张宴,“成都一岁故事始于此,士女大集拜(安福寺)塔下,燃香挂幡以禳兵火之灾”^{[3]卷十七,232}。又如三月二十一日宴于海云寺,吴中复《游海云寺唱和诗》王霖序云:“成都风俗,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太守出郊,建高旗,鸣笳鼓,作驰骑之戏,大宴宾从,以主民乐。观者夹道百重,飞盖蔽山野,欢讴嬉笑之声,虽田野间如市井,其盛如此。”^{[4]187}再如四月十九日游浣花溪,“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每当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妆,南出锦官门,稍折而东行十里,入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名其游与其日”^{[4]881}等等不一而足。地方官府的作用是顺应民风,又通过自己宴集时的助兴表演活动来聚集、引导民众,既丰富了士庶的节日游乐活动,又能掌控局面,及时处理一些违规乱法或扰乱治安的事件,还有“与民同乐”的氛围;同时,聚集的人流,过节的特殊气氛,也带来了集中消费的商机。

(二)宋代成都知府新增节日游乐活动

成都知府,按宋代称谓,应是知成都府。有宋一代,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任命“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5]卷六,148},到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至五年(1245)冯有硕权知成都府为止,276 年间共任命了 142 位成都知府,其中北宋 87 位、南宋 55 位^{[6]9-19}。据资料记载,张咏、赵稹、薛奎、文彦博、田况、宋祁、赵抃等七人在任成都知府期间新增了节日游乐活动内容。

1. 张咏

张咏,号乖崖,太宗和真宗朝两度出知成都,尤其是第二次知益州,保证了蜀地的稳定和发展,政绩突出,受到真宗的奖谕,称“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7]卷二九三,9804}。在节日活动方面,他主要增加了以下内容。

第一,兴上元节残灯会。成都上元节放灯三夜,官府搭建山棚,制作变幻新奇的灯笼,举行灯会。“成都府灯山或过于阙前,上为飞桥山亭,太守以次,止三数人历诸亭榭,各数杯乃下。从僚属饮棚前,如京师棘盆处,缉木为垣,其中旋植花卉,旧日捕山禽杂兽满其中,后止图刻土木为之。蜀人性不兢,以次登垣,旋绕观览”^{[8]卷十,104}。灯山的壮美、繁复不减京师,其中“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而且“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9]卷上,21}。可见,成都的元宵节已成了狂欢节,元宵节时的成都已然不夜城。灯会结束后,由通判主持宴请灯会期间负责治安的都监,称“残灯会”。它开始于张咏任职时,且初在十七日举行,南宋时已无固定日期。

第二,正月二十三日圣寿寺设蚕市,使民鬻农器。

第三,二月二日游江。二月二日是成都的踏青节,士庶百姓前往四郊游赏,但这也给“不法之徒”提供了机会,所以,“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岗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旗望之。后乖崖公帅蜀,乃曰: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乃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于是郡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倍于往岁,薄暮方回”^{[8]卷一,11}。张咏把原来分散在四处游赏的人们,通过增加官员僚属参加的游江活动聚集起来,变原来官府“监视”士民游赏为官员参与游赏,拉近了官民距离,丰富了节日游乐活动内容。张咏为此作诗道:

春游千万家,美女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我身岂比浮游辈,蜀地重来治凋瘵。见人非理即伤嗟,见人欢乐生慈爱。花间歌管媒春阳,花外行人欲断肠。更觉花心妒兰麝,风来绕郭闻轻香。昔贤孜孜戒骄荡,猖狂不是风流样。但使家肥存礼让,岁岁春光好游赏。^{[10]卷二,587}

诗的前四句描绘了成都春游的盛况,后面则写出自己作为地方长官的责任。因为他看到了“非理”的行为,想到了“花外断肠人”,所以他要“治凋瘵”,告戒巴蜀人民,不要骄荡和猖狂,而要勤奋生产、尊礼守法、相

互谦让,只有这样,才能家富人旺,年年享受好春光。

第四,令僧司作会。《东斋记事》记:“张尚书再任蜀,承甲午、庚子年后,户口凋丧。久之,乃谕僧司,令作大会,集四路僧,以观民心,与其登耗。是时,荐更乱离,人家稍复生业,公大喜。”^{[11]卷四,34}实际上,这是利用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发挥僧徒从善修行的引导作用,聚集民心,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的举措。

张咏在蜀期间,充分了解蜀地风俗,并加以引导,他新增的这些活动,直到南宋还在开展,所以韩琦说:“蜀风尚侈,好邀乐,公(张咏)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饌之品,皆著为常法,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12]卷五,545}张咏成为宋代治蜀名臣^⑤。

2. 赵稹

赵稹,天禧元年(1017)九月至四年(1020)十一月知益州,新增了寒食开西园,使士庶游观的活动。西园,或称西楼,本是后蜀权臣住宅,北宋灭蜀后,这里成为成都府路转运司的衙门楼阁,是成都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园林。吕陶《净德集》卷十三《重修成都西楼记》曰:“府署西楼,创建远矣,宅园林之胜地。登临阔视,可以极山川之秀景,燕闲高会,可以快风月之清意。岁之方春,物状尤异,红葩鲜妍,台榭交辉,绿树茂密,亭宇争荫。吾民来游,醉于楼下,实一方之伟观,四时之绝商也。”是官员士大夫集会行乐的胜地。天禧三年(1019),知州赵稹把这一胜地向成都士庶开放,从此,每年寒食节都开园张乐,“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廷游宴之盛”,到南宋甚至“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13]138}。庄绰也记载:“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9]卷上,20},使得成都的节日游乐更加大众化。

3. 薛奎

薛奎,仁宗天圣四年(1026)三月至六年(1028)三月知益州。他一改知开封府时“为政严敏,击断无所贷”^{[7]卷二八六,9630}而被称为“薛出油”的形象,“随其俗与之嬉游,作何处春游好诗十首,自号‘薛春游’,欲换前所称也”^{[11]卷三,25}。他顺从蜀人正月二、三日上冢的习俗,率幕僚出城在大东门外置会^{[11]卷四,35},以聚集郡人,引导和把握士庶的游乐。

4. 文彦博

文彦博,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至七年(1047)三月知益州,受封文潞公。他在成都期间,继续举行张咏时的游乐活动,“僧司因用张公故事,请作朋会,公许之。四路州军人众,悉来观看,填溢坊巷,有践踏至死者,客店求宿,一夜千钱”^{[11]卷四,34}。僧司作会,不仅吸引成都本地人参加,而且还有来自川峡四路各地的民众,以致出现了践踏事故,但它也为商家带来了商机,旅店房间价格上涨就是典型例子。另有记载,文潞公在成都宴集很多,仁宗派何郯去成都调查,结果何郯也常常参加文潞公的宴集而且大醉,“圣从还朝,潞公之谤乃息”^{[13]卷十,101}。文潞公还在成都江渎庙修建设厅,伏日在此宴会避暑,这是他新增的游乐活动,设厅后来成为一州名胜,“(江渎)庙前临清池,有岛屿竹木之胜,红蕖夏发,水碧四照,为一州之观”^{[14]卷一,9}。

5. 田况

田况,庆历八年(1048)四月至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知益州,实行以教育为先、惩罚在后的宽政,使“蜀人爱公,以继张忠定,而谓公所断治为未尝有误”^{[15]卷九十一,942}。他在蜀期间,也积极投身到游乐队伍中,并以诗记下自己的所见和感受,力图纠正社会上对蜀人好游娱、无节制的印象和看法。他云:“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娱无时,予始亦信。然之,逮忝命守益,梶辘踰月,即及春游,每与民共乐,则作一诗以记其事,自岁元徂□至止得古律长调短韵共二十一章,其间上元灯夕、清明、重九、七夕、岁至之类,又皆天下之所共,岂曰无时哉!传之者过矣。蜀之士君子欲予诗闻于四方,使知其俗,故复序以见怀。”^{[4]卷九,380}他还于三月二十七日原在成都西小市桥举行的蚕市,移至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举行,使庙里祭祀朝拜与官员宴集和民众贸易活动相结合,此活动一直延续到南宋。

6. 宋祁

宋祁,嘉祐元年(1056)八月至三年(1058)十月知益州。关于他的任命,还有一段故事:“刘沆为集贤相,欲以刁约为三司判官,与首台陈恭公议不合,刘再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刘作奏札子,怀之,与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谁可守者?’二相未对,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陈恭公曰:‘益俗奢

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约荒饮无度,犹在馆,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刘公惘然惊惧,于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约荐焉。”^{[16]卷十三,151} 宋祁“喜游宴”是朝廷所共知的事实,但仁宗还是坚持派他去成都,说明仁宗看重的是他的治理才干。宋祁到成都后,他的这一爱好的确得以发挥,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影响政治前途和身体健康的大小麻烦。据记载:“宋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16]卷十五,171} 修唐书时众多内宠的服侍,使他好一番享受;可当天冷时,面对十几件衣服,他却宁愿受冷而不敢穿一件,又使他好一阵烦恼。他新增了正月二日官员宴集结束后,使“妓以新词送茶”的活动内容。因他在蜀奢侈过度,受到御史中丞包拯的弹劾而“不可任三司”^{[7]卷二百八十四,9598}。不过,当他的讦告传至成都时,“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17]卷十九,147},说明他还是深受蜀民拥戴的。

7. 赵抃

赵抃,他曾四次入蜀任官,其中三次在成都(一任转运使,二任知府)^⑥。他为政简易,“以宽为治”,“惠利为本”^{[7]10323,10325},不仅赢得了统治者的称誉,也使“蜀民歌之”^{[18]卷一,113}。在成都期间,赵抃也从俗游宴,一些节日活动规模甚至比以前大有增加,如正月二日的游江,“彩舫至增数倍”。但伏日的宴集规模却减小了,即由原来三伏俱宴改为只在初伏日举行了^{[1]127,145}。

以上官员都为成都节日游乐活动秩序的维护、内容的丰富,立下了大功,是成都传统节日文化的创造者。当然也有反面教材,如宋哲宗时任命蔡京知成都府,翰林学士梁燾反对,指出:“今若用此人,必非成都幸。”但并未被采纳,后来,“京至成都,果以轻举妄作。盗发正昼,烧药市几尽。后又为万僧会,穷极侈丽,两川骚扰,齐集累日,士女离乱,恶少群辈杀人剽夺一日十数处云”^{[5]卷四百七十二,11259}。蔡京在成都,不但没能聚集人气,新创游乐活动,甚至连原有的也被破坏和走样,北宋的末路也近了。

可见,宋代成都官府对节日消费的举措主要是在官员僚属积极参与、新增活动内容、维持安定秩序、聚集人气等方面,实际上是引导民众集中消费的有意尝试,也为节日市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二 宋代成都节日市场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指出:“任何一种社会集会(如宗教节日)都能为贸易提供机会,贸易开始是偶然性的,但逐渐变为经常性的。带来的商品最初可能仅供节日期间个人消费或作为献给上帝的礼物,但如果参加者携带的物品不完全一样,他们会试着用带来的货物互相交换。它开始时纯粹是一种附带的副业,并且如果利益比较可观时,这种新的活动便会成长起来;而且可能发展很快,而与集会的最初动机大相径庭。宗教性的‘收获的喜庆日’变成了乡村的定期市。”^{[19]26} 节日之前的过节准备,节日期间的人潮涌动,加之官府通过宴集活动的有意引导,使得成都的节日交易异常活跃,节日喜庆日变成了定期集市。大致情况见表2。

表 2. 宋代成都节日市场

日期	贸易地点	市场名称(或贸易内容)	资料来源
正月五日	五门	蚕市 贸鬻百货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正月二十三日	圣寿寺	蚕市 鬻农器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月二日	宝历寺	蚕市	《岁华纪丽谱》、《岁时广记》
二月八日	观街	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三月三日		巫覡卖符于道	《岁华纪丽谱》
三月九日	观街	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三月二十七日	大西门睿圣夫人庙	蚕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四月初	西园	寒食节 酒炉、花市、茶房、食肆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五月五日	大慈寺	医人鬻艾、道人卖符珍货奇巧	《岁华纪丽谱》、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
七月七日	锦江	夜市	《岁华纪丽谱》
九月九日	玉局观	药市	《岁华纪丽谱》

表 2 显示的都是比较成熟的定期集市,它们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举行,在川蜀生产发展、商品流通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蚕市举行最多,一年达 5 次,其次是药市,一年达 3 次,其余既与节日物品的使用有关,也与社会发展的脉搏相联。

(一)蚕市

蜀地蚕桑业历史悠久,蚕市是在唐代末期出现的以买卖蚕器农具为主,兼有其它百货器物的集市^⑦。起初并没固定时间,到五代前蜀时,固定为每年三月,且已有“蜀人称其繁盛”^{[20]3186}。到了宋代,蚕桑业进一步发展,成都附近的新繁县还出现了废蚕不养,专“鬻其桑叶,大获其利”^{[21]卷九,959}的专业化趋势。成都蚕市交易也更频繁,每年从正月至三月共举行四、五次,地点分散在西南边的五门、圣寿寺,东南边的宝历寺和西边的大西门睿圣夫人庙等,几乎囊括城市四周。同时,成都附近州县如眉州、金堂县、新繁县等也有蚕市,“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21]卷九,956},但繁荣程度不及成都。

苏辙《蚕市》诗写道:“枯桑舒牙叶渐青,新蚕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随手败,今冬衣着及春营。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鉏耨资男耕。空巷无人鬪容冶,六亲相见争邀迎。酒肴劝属坊市满,鼓笛繁乱倡优狞。蚕丛在时已如此,古人虽没谁敢更。异方不见古风俗,但向陌上闻吹笙。”^{[22]卷一,22}从中可见,农民需要为开春后的生产和生活所作的准备有:养新蚕的工具,男子耕作的农具(鉏耨),冬天的衣服,妇女的针织用品等,这些都须通过蚕市买来,资金来自变卖全家人基本口粮以外的余粮所得。

苏轼《和子由蚕市》诗进一步说:“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翅金与纨。”^{[23]卷一,57}题名为王十朋注云:“荻、箔,乃荐蚕之具,瓢、轮、土釜乃缫丝之物。”^{[24]卷十四,272}说明蚕市上所售货物以养蚕缫丝工具为主,此外,市上有农具,前述张咏在圣寿寺前设蚕市,目的就是“使民鬻农器”;也有琳琅满目的小商品,“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多,碎琐皆不遗”^{[4]381};还有花木、果实、草药等等。既有“龙断争趋利”,“经年储百货,有意享千金”的大商人,也有“器用先农事,人声混乐音”^{[4]381}的小市民;蚕市还是人们邀亲朋、听鼓乐、行游乐的好去处,《岁时广记》卷一《鬻蚕器》引张仲殊词云:“成都好,蚕市趁遨游。”由于众人聚集在蚕市,使得市上的酒店、食店客人满座。这些都表明,宋代成都的蚕市已是集蚕器、农具、粮食、百货等商品买卖,酒店、食店等饮食消费以及鼓笛声乐等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定期集市。

(二)药市

药市也出现于唐末。至宋每年二月八日、三月九日、九月九日于观街(玉局观前)、大慈寺举行,尤其是玉局观,陆游说:“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25]卷六,80}大慈寺里“四方之人,至于此者,徒见游手末技,憧憧凑集,珍货奇巧,罗陈如市”^{[4]卷四十五,792},同样是集贸易与游乐于一体的地方。

药市上所售以药物为多,这是因为川蜀春夏多雨潮湿,容易引起人们身体疾病;同时,盆地周围,大山环抱,药材资源丰富。宋祁有“西南岁多瘡,卑湿连春夏,……顾赖药石功”^{[26]卷六,72}的诗句。他还记:“成都九月九日药市,芎与大黄如积,香溢于廛。”又说:“大黄,蜀山多有之。”^{[26]卷四十七,608}大黄来自本地。也有来自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珍贵药材,“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载云。然世南顷游成都,药市间多见之。询所出,云‘来自黎、雅诸蕃,及西和、宕昌’,亦诸蕃宝货所聚处”^{[27]卷二,12}。庄绰记:“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9]卷上,21}药市上的犀角、麝香不仅很多,而且来自边远地区。《夷坚志》记,有广州人贩香药至成都售卖^{[28]卷二,1734},说明药市上还有来自两广地区的药物。成都药市已成为大西南药物集散中心。

正由于集市上药物多,药物所散发的药气也能治病。“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

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是日雨，云有仙人在其中。张仲殊作望江南以咏之曰：成都好，药市宴游间，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看神仙，飘渺结灵烟。云影里，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8]卷三十六,399}苏轼也说：“又如病人游药市，闻众药香，病自衰减。”^{[23]卷三十七,515}说得有些玄，似乎有一定道理也未可知。此外，药市上也是百货杂陈，还能遇到宝物，“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药市，见一铜鼎，已破缺，旁一人赞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归以数炉炷香环此鼎，香皆聚于中。’试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异”^{[29]卷十二,520}。药市是成都仅次于蚕市的又一定期集市。

(三)酒市

酒是节日气氛的调节剂，既是饮品，又是礼品、祭品，是官员宴集、士庶家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节日物品，消费量巨大。节日里，官员既以酒聚集人众，又大肆促销官库酒，如“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洛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有骑兵善于驰射，每守出城，以奔骤于前。夹道作棚为五七层，人立其上以观，但见其首，谓之‘人头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容数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9]卷上,21}官府利用人多集中的时候销售酒，用大舰装酒，其数量一定少不了，每个游人给一升酒，这应属于强制销售的一种方法；名道人则随便喝，就是现在的啤酒展销会也没有这样的促销力度。这一招果然很灵，四月十九日，成都倾城而出涌向浣花溪，水中彩舟密集、岸上人头窜动。“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彩绘，连檣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阗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菘之人，至相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4]卷四十六,799}人们借贷也要游赏浣花溪，官府有“免费”酒饮或是很关键原因。

酒坊促销也颇具特色，《鸡肋编》卷上记：“使宅后辅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集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橙，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这属于“设法”销酒之法，“今用女倡卖酒命曰‘设法’”^{[30]卷十五,164}。酒坊为了丰厚酒利，还一再要求延长开放西园的时间，甚至一月之后，“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1]138}。

成都官员节日期间相互馈送酒的风气也很浓，赵抃说：“臣伏见益、梓等路诸州军，每遇时序，或隔路，或邻近，更互送遗节酒，多差衙前急脚子驱逐递铺兵士，并役使百姓人夫，往来络绎，担擎劳苦，州县骚动，嗟叹之声，不绝道路”^{[31]卷九,875}，致使“衙前治厨，传破家相属也”^{[23]卷八十六,394}。赵抃对此进行了整顿。

正是由于节日酒所具有的特点，使得成都酒市活跃，形成了定期集市——十月酒市。李华瑞先生说：“虽然现无更多的材料来说明成都酒市的基本盛况，但从成都酿酒业和酒课在北南宋时期均在全国名列前茅来推测，其繁华之状是可以想见的。”^{[32]293}实际上，通过上面的叙述已可看出成都酒市的繁华状况了。

(四)夜市

由于唐末以来不禁夜制度的实行，使城市夜市兴起。宋代不仅都城夜市繁盛^⑧，地方城市也出现了夜市。成都夜市的繁盛就有上元节三夜放灯时的灯市，寒食节开西园、四月十九日游浣花以及七月七日锦江的夜市等。《方輿胜览》卷五十一《成都府路》引《成都志》载古诗：“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说明锦江夜市早已有之。张咏在蜀时，时民间讹言云：“有白头老翁午后食人男女。郡县讙讙，至暮路无行人。公召犀浦知县谓曰：‘近讹言惑众，汝归县去，访市肆中归明人尚为乡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证解来。’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于诚断，不在乎厌胜。’”^{[10]卷十二,651}通过整顿治安，保证了夜市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和交易。七月七日，成都府帅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已成为固定宴集活动，田况写有《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观夜市》诗。到徽宗政和年间，此活动更盛，以致引起朝廷关注。“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诏：访闻成都大慈寺

门楼斜廊,安设鸱尾,沿袭五季专恣之弊,僭奢无度。其帅府监司,七夕率皆登历宴饮,无复忌惮,吏民聚观,不可以训。今后七夕排当登寺门事可罢。如更有以此亏违典礼者,仰帅臣禁止施行”^{[2]刑法2之65},但没落实下去,因为到南宋时府帅七夕登寺楼观夜市的活动还在进行。

除以上四种成熟、活跃的定期集市外,宋代成都节日市场还有:寒食节开西园时,酒垆、花市、茶房、食肆等交易过于蚕市,房租价格大涨;三月三日,巫覡卖符于道,苏轼诗写道:“何人聚众称道人,遮道卖符色怒嗔。宜蚕使汝茧如甕,宜畜使汝羊如麕。路人未必信此语,强为买符禳新春。道人得钱径沽酒,醉倒自谓吾符神”^{[23]卷一,56};五月五日,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缕长命避灾之物等等与节日习俗密切相关的商品市场。

总之,宋代成都节日市场丰富多彩,每月有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33]卷六十二,2903}。

三 宋代成都节日市场特征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宋代成都节日市场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一)以地方习俗及其消费风气为支撑

一个节日总是由特定的习俗活动所构成,而那些习俗活动又是通过制作、使用或消耗一些物品表现出来,这样,这些物品便具有了刚性消费的特点。德国经济学家施里特说过:“刚性在习俗的运行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任何完全适应性的习俗,即使非常迟钝,都可能最适合减慢经济和其它的激励传输的速度,然而,在完全不同的方面,一个刚性的习俗可能引导经济力量。”^{[34]54}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又赖都江堰灌溉之利,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加上人民的勤劳,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容易得到满足。“(蜀)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7]卷八十九,2230}“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乐。”^{[7]卷二百五十七,8950}前述及四月十九日外地人借贷游赏浣花溪等等所记都是蜀人不积蓄、及时消费、尤喜遨游的习俗特点。而这样的习俗和消费风气,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讲究储蓄节俭的社会里是会遭到非议的。所以,蜀人自己不愿承认,官员也力求为之辩解,殊不知正是蜀地好游乐、爱消费的习俗和风气,不仅带来了成都节日市场的活跃及其向定期市场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宋代四川经济的繁荣和发展^{[35]1-4}。

(二)官府力量的作用

宋代成都节日市场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官方力量推动的结果,这不仅表现在朝廷对此地风俗的认可和市场的保护,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三月,“辛巳,比部郎中蔡沆使西川还,言川、峡每春州县聚游人货药,谓之药市,望令禁止之。上曰:‘远方各从其俗,不可禁也’”^{[5]卷七十五,1658},而且表现在几乎所有有作为的地方长官都顺应民风,通过宴集、新增节日活动内容等措施,积极引导人们的游赏和消费。朝廷也给予宴集经费资助,主要有两项。一是酒课收入。北宋实行征酒税的法令,制度不很严密。淳化四年(993)诏令:“诸州以茶、盐、酒税课利送纳资府,于是稍严密矣。”咸平四年(1001),规定诸州每年应征的课额,但“藏之州县而已”;庆历二年(1042),“初收增添盐、酒课利钱,岁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余贯上京”,才开始实行酒税上供中央政策。川蜀的榷酒是“取其税,不禁其私”^{[36]议酒,745},所以,“榷酤之利有余,人乐于为役,公帑岁入亡虑千万贯有奇”^{[1]107}。这里的“千万贯”实有夸张,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之十六记,熙宁十年前,成都28个酒务的酒税收入是439779贯,超过京师开封府的榷酒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二是公使钱,又称公用钱,是各级官署的办公费,多用于饮宴厨传之费^{[37]482}。熙宁年间,定立各路州军公使钱额,“司农定诸州所用公使钱,奢俭各不中礼,甚至或至非理掊克,今当量入为出,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若三京、[西北]三路帅府、成都、杭、广自来所用多者,增其数。诏从之”^{[5]卷二百一十九,5328}。可见,成都是自来所用公使钱特多的地区之一。市场秩序也由地方官府维持,如宋初知成都府的吕余庆上任后,“时盗四起,将士犹恃功骄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药市始集,街吏驰报有军校被酒持刃,夺贾人物,余庆立命擒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民乃宁居”^{[5]卷六,148}。南宋庄绰也记载:“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药市)。”地方官员还新创市场,如张咏正月二十三日在圣寿寺前设蚕市,“使民鬻农器”;在四月游江时,促销官酒;在七夕,观夜市;……节日市场到处都有官府的身影。所以苏轼说:“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

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23]卷一,57}蜀人的游乐并非是在丰衣足食基础之上,这里仍是人多地少,仍需一年辛苦耕耘,农闲时的集市既是人们休闲游乐之地,又是准备来年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时日。

正是由于宋代成都节日市场过多依赖于官府力量,所以官方政策的变化、地方官的行为必定使其受到影响。如嘉祐四年至六年(1059—1061),知益州的王素开始着手裁减游宴开支费用,“益部会府宴设,岁费为钱数千万,取给牙校,习以为常,公为裁节,所损几半”^{[38]卷三十七,435}。熙宁变法,成都置市易务后,地方官的游宴费用继续减少,游赏不如当年了,“自新法颁行,酒坊为官所鬻,牙校虽得券钱不足自贍。乃者议置成都市易务,方游观时,人情懼然,减常岁之半。及浣花后,始闻罢去,乃复朋聚游江。今公使钱岁给三万贯,常虞虞虑不足”^{[1]107}。三万贯,是南宋时期成都地方官府游宴的费用,尽管已超出熙宁年间最高定额的六倍之多,但无法与北宋初年成都的游宴费用相提并论。熙宁之后,成都游宴规模大为缩减,如赵抃知成都时,原来三伏都宴集的成规也因公使钱的减少改为只在初伏举行了,自然,与游宴活动有关的土庶游赏、买卖活跃等都相应走样。到南宋末年,文天祥说:“益州承平时,元夕宴游,其风流……而今不可复得矣。”^{[39]卷下,54}成都节日市场在经历了北宋中后期及南宋前中期的发展繁荣之后,走向了衰弱。

(本文系提交2012年8月底在开封召开的宋史年会交流论文的修改稿,在此谨对给予过批评指教的与会同仁表示感谢!尤其是张邦炜先生提出了具体而中肯的意见,一并致以深深谢意!)

注释:

- ① 范百禄《成都古今集序》,(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30,刘琳、王晓波点校,线装书局2003年版。
- ② 陈世松《宋代成都游乐之风的历史考察》,载《四川文物》1998年第3期,第37-43页。
- ③ 陈国堂《宋代成都蚕市》,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第49-65页。
- ④ 吴擎华《试论宋代四川市场》(《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第97-102页)一文,把蚕市、药市作为特殊集市的类型作了简单叙述。
- ⑤ 张其凡《治蜀名臣张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124-131页。
- ⑥ 粟品孝《赵抃与四川》,《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31-35页。
- ⑦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253,第8213页)乾符六年四月甲子条,胡三省注曰:“(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成都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鬻香、药于一所,号药市;鬻器用者号十宝市)。”
- ⑧ 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卷三《马行街铺席》;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夜市》。

参考文献:

- [1] 岁华纪丽谱[G]. 谢元鲁校释//巴蜀丛书:第1辑. 成都:巴蜀书社,1988.
- [2]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3] (宋)范成大. 范石湖集[G]//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4] (宋)袁说友,等(编). 成都文类[M]. 赵晓兰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5]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G].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6] 官性根. 宋代成都府政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10.
- [7] (元)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 (宋)陈元靓. 岁时广记[G]//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宋)庄绰. 鸡肋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 (宋)张咏. 乖崖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5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1] (宋)范镇. 东斋记事[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 (宋)韩琦. 安阳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3] (宋)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4] (明)曹学佺. 蜀中名胜记[G]//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 (宋)王安石. 临川先生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6](宋)魏泰.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7](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8](宋)郑獬.郤溪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9](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20]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六)[G].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 [21](宋)黄休复.茅亭客话[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2](宋)苏辙.栞城集[M].曾枣庄,马德富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3](宋)苏轼.东坡全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4](宋)王十朋.东坡诗集注[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5](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6](宋)宋祁.景文集[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7](宋)张世南.游宦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8](宋)洪迈.夷坚志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9](宋)周焯.清波杂志校注[M].刘永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0](宋)王懋赞.野客丛书[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1](宋)赵抃.清献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2]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 and 征榷[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
- [33]赵抃.成都古今记[G]//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4](德)埃克哈特·施里特.习俗与经济[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
- [35]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36](宋)曾巩.曾巩集·辑佚[M].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7]汪圣铎.两宋财政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38](宋)张方平.乐全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9](宋)文天祥.文山全集[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The Official Power and Chengdu Holiday Market in the Song Dynasty

WEI Hua-xian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gdu had rich products, highly developed commercial economy and the monthly trading market which was droved by the staple commodities. The local government took advantage of local residents' affection for amusement and consuming and held banquet activities to guide the festival consumption of the public. The festival consumption market was then very prosperous, especially the silk market, medicine market, wine market, night market and etc, since people need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daily necessities. The festival market of Chengdu in Song Dynasty was not only supported by the local customs, but also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so that it maintained prosperous for a long time but quickly declined with the change of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olicies.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Chengdu officials; Chengdu holiday market; holiday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